

《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创伤书写研究

陈巧梅

福建师范大学

摘要：《老人与海》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创作的一篇优秀中篇小说，于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自出版以来，小说就广受学界关注，其语言风格、主题思想、创作思想等成为研究热点，然而他的创伤却鲜有研究涉及。本文从创伤理论视角研究圣地亚哥的创伤书写，关照其身体、精神与文化创伤，分析他的创伤表征与复原方式，论述圣地亚哥“硬汉式英雄”的塑造方式以及老人与海明威的联系。从该视角思考主人公的人物塑造不仅能深刻理解圣地亚哥的英雄特质，也有助于了解海明威的写作思想与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海明威；《老人与海》；圣地亚哥；创伤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8.054

一、引言

《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创作的一篇中篇小说，该小说于1952年出版，1954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海明威创作生涯中的鼎力之作。小说中，老渔夫圣地亚哥经历了84天捕不到鱼的失败后，在第85天遇到大鲨鱼并与之搏斗争抢大马林鱼，最终大马林鱼被鲨鱼撕扯得仅剩一副骨架，以致于老人不得不带着残骸返航。当时哈维·布莱特(Harvey Breit, 1952: 194)评论该小说是“一部伟大而真实的小说，既动人心弦，又令人震撼；既是悲剧性的，又是乐观的”。

虽然小说《老人与海》的篇幅短小精悍，但却意蕴丰富。自问世以来便广受学界关注，历来的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小说的写作风格、主题思想、殖民主义、生态书写、宗教内涵等。其中不乏对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的研究，既涉及了其硬汉式英雄的表现、人物的宗教原型、也剖析了人物的命运走向、探究了他的移民身份等。在前人研究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可以窥见圣地亚哥经受了多重创伤。创伤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常见于医学领域，一般指的是外界因素造成的身体损害或心理损害。到了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Kathy Caruth, 1996)在其著作《沉默的经验》中首次提出“创伤理论”这一术语，她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然而，圣地亚哥的创伤书写却没有被学界所关注，因此本文将从创伤书写的视角解读他所经身的身体、精神和文化创伤，探究其创伤缘由、表征以及疗愈方式，深入理解其硬汉式英雄形象的塑造方式和海明威个人的创伤转移过程。

二、身体创伤：复杂的伤痕

老渔夫圣地亚哥经身复杂的身体创伤，其一源于他所代表的人类力量与大鱼表征的自然力量之间的对抗。

圣地亚哥在经历了84天未捕到鱼的失败后，独自乘船出海、漂泊海上。幸运的是第85天他捕到了一条18英寸的大马林鱼，然而正当他回岸时，遇到了抢食的大鲨鱼。鲨鱼惊人的速度、凶猛的捕食血性以及成群结队的“同伙”力量，让独自守护大马林鱼的圣地亚哥难以对抗，这让他深深感受到自身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感。其二源于圣地亚哥对于现代捕鱼工具的拒绝和传统捕鱼工具的坚守。老渔夫生活的年代处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时期。现代捕鱼工具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显示出更加安全便利的特点，然而他却并不改变其传统落后的捕鱼方式，拒绝了新兴的现代捕鱼工具。他所经身的身体创伤因此也更为明显与复杂。

在人类与自然、现代与传统捕鱼工具的抗衡中，圣地亚哥所遭受的身体创伤表征为复杂的伤痕。皮肤层面而言，常年在热带海面上捕鱼的他，皮肤受到太阳反光形成褐斑，发展为一种皮肤病变。他常用绳索拉大鱼的双手也勒下了很深的伤疤，就“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2)。”尤其他的左手在放绳索、拿鱼叉、拖鱼时多次抽筋、不受控制，逐渐失去了掌控能力。在老人看来，左手背叛了自己，十分丢脸。而在身体营养供给上，老人常常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近三个月一无所获，可见他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美国北卡罗纳大学的瓦伦蒂教授(Valenti)曾在《〈老人与海〉解读》一书中，引用了她与阿林·穆勒(Arlyn Moeller)医生的一节访谈来探讨老渔夫的贫困生活与身体状况的关系：穆勒认为，根据小说中对老渔夫身体的描述，可以判断出他是因为长期缺少食物摄入而造成营养不良的。而他左手剧烈抽筋以及在远海与大马林鱼争斗期间的不良反应，是由于严重缺钙所导致(2007: 64-65)。另外，在穆勒看来，圣地亚哥在海上的第三天出现眩晕、视力不清的情况是属于身体脱水症状。由此可见，圣地亚哥的身体创伤主要表现在皮肤复杂的伤痕上以及身体缺失的养分。

赫尔曼（Herman）提出，创伤治疗的方式之一在于照顾自己，掌控身体，“安全的建立开始于对身体的掌控，然后向外发展至自我保护和设立安全环境（2015：266）。”虽然圣地亚哥不在意营养不良的状态，但当他发现捕鱼时容易眩晕和左手抽筋的情况时做出了应对。在日常生活中，老渔夫常常会喝鲨鱼肝油。尽管鱼肝油难闻，不过它防治一切流感伤风和明目都行之有效。因此为了明目、减少目眩，老人坚持饮用鱼肝油。这种食疗方式是圣地亚哥重新掌控自己视力的策略，以此保证自身在海上捕鱼时能够充分发挥捕鱼能力。而对其左手抽搐不受控的身体创伤，他潜意识地使用了移情的创伤疗愈。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探讨了心理移情转向现实原则的过程。他（1989）认为，基于现实原则，人能够通过心理移情将失去外在认同客体的自我把心理能量转移到新客体上。在面对左手不断抽搐时，圣地亚哥不再纠结于“左手是个梦想者”这一想法，他将心理能量转移到新的客体中，选择用右臂来对付它。此外，圣地亚哥的心理移情更多体现在其渴望对大马林鱼的征服和与大鲨鱼的搏斗上，野心让他忽视了原有创伤。他希望通过与大鱼之间的搏斗来证明自己右手（新客体）的能量。总之，面对身体创伤，圣地亚哥的疗愈方式凸显了海明威笔下对硬汉式英雄的定义，“重压下的优雅”。他的食物疗愈与心理移情并非为了恢复自己的身体样貌，而是为了征服大鱼与自然而努力。

三、精神创伤：式微的力量

圣地亚哥不仅遭受了复杂的身体创伤，同样也经受了长期的精神创伤。聂珍钊教授指出，“老人在一种强者的语境中通过狮子意象表达自己要成为‘硬汉子’的信念（2009：82）。”而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老人的体力逐渐式微，捕鱼的能力也趋向有限，导致他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硬汉，这带来的精神创伤程度更甚于身体的多重伤痕。

在第85天出海捕鱼的历程中，他的精神创伤书写得到了凸显。每当孤立无援时，老人便常常念叨着“要是小男孩在就好了”。对老人而言，小男孩马诺林让他回想到过去的青春。小男孩让他燃起了对青年力量的渴望，然而如今式微的体力只能让他处于精神受创的状态。此外，其精神创伤表征又以多次的狮子意象和非洲记忆呈现。狮子是百兽之王，陆地上最凶猛的动物。聂珍钊教授（2009：84）认为，狮子代表着一种丛林法则，这一法则是自然界所有动物生存斗争的基本法则。老人反复提及狮子，实质上揭示了老人潜意识里的想法，即生存竞争的伦理意识。这一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在老人体力式微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支撑他去战

胜海洋中的“猛兽”大鲨鱼与大马林鱼。而非洲海边的壮年记忆回述也进一步凸显了他自身能力衰弱的精神创伤。

圣地亚哥最初在面对自己力量式微时以禁闭畏缩的方式面对这一窘境。赫尔曼（2015）提到，如果一个人感到无能为力、各种形式的抗拒也没有希望时，他也许就会进入一种屈服放弃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我防御机制处于停顿关闭的状态，但受创的个体并非以真实行动脱离处境，而是改变其意识状态。在他看来，意识改变就是禁闭畏缩或麻木无感的核心状态，同时也被认为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三个症状。在小说中，圣地亚哥多次感慨自己出海太远了，自己式微的体力与能力无法保护战利品大马林鱼，导致其被吃掉了约四十磅的肉。原本精神饱满的老人充满战斗的志气，但受限自己的能力，因此最后只能流露出无奈麻木的状态。尤其是在老人返航后，再次感慨了他失去了一切。站在岸边，圣地亚哥落寞疲乏地看着被拖回的大马林鱼骨架，内心阻塞、表面麻木，将桅杆横在肩上往上爬。然而，老人并非将禁闭退缩当成一种常态，在多数情况下，他直面创伤。精神创伤夺走了圣地亚哥的力量和主控的感觉，而复原的方式在于恢复自身的力量和主导权。首先左手抽搐的情况没有阻止他捕鱼，相反圣地亚哥运用其高超的捕鱼技艺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他将施力较轻的工具用于左手，比如钓索，而鱼叉的使用则分配给右手操作，以此均衡左右手的力量从而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此外，圣地亚哥亦通过移情转化创伤记忆，回忆壮年时期在非洲的经历获取精神力量，忽略当时能力式微带来的心理与精神创伤。这一方式让圣地亚哥逐渐与自己和解，也渐渐舒缓了自身的精神创伤。

四、文化创伤：流散的身份

老人圣地亚哥在小镇上“他者化”的生活状态与其身份上的文化印记密切相关。海明威曾在写给《纽约客》记者莉莲·罗斯（Lillian Ross）的信中谈到老人圣地亚哥的身份问题：“在我的小说中，老人是个出生在加那利群岛的兰扎罗塔岛的天主教徒（1981：807）。”而他的另一身份是西班牙移民者。著名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1990：277）在《海明威传》中提到，圣地亚哥的生活原型是古巴的一名渔夫，名字是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他曾在海明威出海钓鱼遭遇风暴时搭救了他。其出生地也正好与《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故乡一致。此外，海明威多次描述到圣地亚哥蓝色的眼睛，而蓝眼睛的古巴人主要移民自欧洲地区。可见，圣地亚哥是流散在古巴小镇上的西班牙移民者。这也成为其经受文化创伤的根源。

圣地亚哥的文化创伤表征为一种异国下的隔离感与

边缘化。西方创伤文化的 疑难之一是创伤体验与历史记忆、象征性创伤事件与创伤事件的矛盾（陶家俊，2001：123）。老人独自生活在古巴小镇上，在不同文化下，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他的孤离感与边缘化一方面源于古巴“他者”的身份事实，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本身孤僻的性格特点。双重因素导致的创伤体验勾起了他过往的记忆。然而，圣地亚哥并非在怀念西班牙的生活状态，每次回忆都扣紧了在非洲海岸边遇到狮子的画面。他本身就是孤独的，也习惯流散在不同的地方，因此他的文化创伤体验都具有孤离感的特征。然而边缘化则主要是在古巴小镇上经受的创伤体验。小镇上的人们与圣地亚哥并不亲近，小男孩的父母也不赞同他们的儿子与老人出海捕鱼。一方面在于老人长时间没有钓到鱼、运气很差，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外来旅居者的身份，与当地文化并无紧密联系。此外，小镇上的其他人与老人也没有直接的语言沟通。另外学者于冬云（2022：147）指出，与圣地亚哥的所处的捕鱼困境不同，小镇上的其他钓鱼顺利的渔民们使用的是汽艇与现代化浮标。可见他们对圣地亚哥的排斥既因为他外者的身份又因为他拒绝接受现代化的捕鱼方式。

心理移情是老人圣地亚哥应对文化创伤的途径之一。他将心理能量从脱离古巴主流生活而经受孤离感的客体上转移到捕鱼与征服自然这一新客体中。小说中对于老人内心的描绘几乎没有着墨，读者主要从他对外界的交流以及身边环境的描写感受出其个体的文化孤离感。在描述圣地亚哥的小屋时，屋内陈设简单、东西简陋。其中一张妻子的遗像更凸显了他的孤独。但是圣地亚哥并没有陷入到孤独的漩涡中，他疗愈文化创伤的移情方式是成功的。对棒球文化的追求、偶像迪马吉奥的推崇以及征服大鱼的信念，都成了老人新的精神寄托。而小男孩给予老人的陪伴不仅反映出一种精神力量，也成为老人与外界联系的一个中介。重新建立与外界的联系感亦是赫尔曼所提，其中包括与自己的和解、重新与人建立心理联系以及解脱创伤等。老人与小镇上其他人的联系仅是通过小男孩完成，小男孩为他买报纸和带来小镇上的消息，使得老人能够及时地了解球赛内容以及小镇上其他人的生活状态与变化。与小男孩的联系成了他打破孤独、进入古巴主流文化社群的最主要途径。总之，在面对文化创伤时，圣地亚哥并非消极沉湎、而是选择了心理移情与重新和外界建立联系感从而从文化创伤体验中恢复起来。

结语

圣地亚哥的创伤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身体伤痕、式微的体力与流散于他国的“边缘”地位都让他的身心发生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然而这些创伤表征的书写并非

让圣地亚哥置于低迷的状态中。相反，从圣地亚哥选择的创伤疗愈方式中，例如心理移情、恢复自主权、重建联系感等，读者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圣地亚哥成为海明威笔下典型的硬汉式英雄的原因。圣地亚哥并不在乎他捕鱼带来的身体伤痕，对于身体创伤的疗愈皆建立在个人重获体力与能力从而继续与大鱼进行抗争的信念之上。而对于文化冲突与社群身份认同的问题，孤离感与边缘化的创伤表征也没有阻止老人追求征服大鱼与自然的信念。圣地亚哥经受的各种创伤以及面对创伤的态度与行为都凸显了他硬汉英雄的特点，即表现出一种“重压下的优雅”。而在圣地亚哥的创伤与复原经历描述中，也能窥见海明威个人命运的经历与人生态度。海明威传奇的一生里遭受了许多致命的身体创伤与心理困境，生命威胁或是创作失意，都让海明威伤痕累累。然而从圣地亚哥对于创伤的应对也侧面看出了海明威个人的硬汉式英雄特征。总之，《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创伤与复原书写不仅表现出其个体的“硬汉式英雄”特质，也凸显了海明威逆境中仍要存有希望的人生信念。

参考文献

- [1] Baker, Carlos, ed.,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1.
- [2]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Freud, Sigmun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M]. New York: Norton, 1989.
- [4] Harvey Brei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review in Nation, 6 September, 1952, 194.
- [5] [美]海明威, 吴劳译.《老人与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6] [美]杰弗里·迈耶斯, 萧耀先等译.《海明威传》[M].北京:北京卓越出版公司, 1990.
- [7] [美]帕特里夏·邓拉维·瓦伦蒂.《〈老人与海〉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8] [美]朱迪思·赫尔曼, 施宏达, 陈文琪译.《创伤与复原》[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 [9] 陶家俊. 创伤[J]. 外国文学, 2011, No. 231 (04): 117-125+159-160.
- [10] 聂珍钊.《老人与海》与丛林法则[J]. 外国文学评论, 2009, No. (03): 80-89.
- [11] 于冬云. 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身份认同与审美乌托邦[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7 (04): 143-156.